

中国全史

(简牍本)

15

财政史
交通史
广告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中国全史

(简读本)

⑮

财 交 广

告

马秀远

编

通

宋彪

编

政

朱二峰

编

史

史

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

总目

财政史……………（一——二一〇）

交通史……………（二一一——四〇一）

广告史……………（四〇三——五八六）

目 录

财 政 史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国家财政	3
一、中国财政范畴的产生	3
二、夏商西周时期财政的特征	11
三、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收入	17
四、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支出	26
五、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管理及理财原则	30
六、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概况	36
七、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改革	41
八、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制度	46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财政	54
一、国家财政形成的背景及其特点	54
二、财政政策	59
三、财政制度	65
四、财政管理	76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财政	80
一、政治经济特点	80
二、财政政策与改革	85

三、财政制度	94
四、财政管理	108
第四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财政	114
一、政治经济特点	114
二、财政政策与财政改革	119
三、财政制度	121
四、财政管理	140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财政	147
一、政治经济特点	147
二、财政政策与财政改革	151
三、财政制度	156
四、财政管理	166
第六章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的清朝后期财政	172
一、社会经济和财政金融的特点	172
二、财政支出的变态	180
三、财政收入的变态	191

交 通 史

第一章 行路难：文化、礼仪与禁忌	213
一、行路难	213
二、饯别	215
三、赠别	217

四、送别	218
五、信仰与禁忌	220
六、尚早、尚俭、尚快	223
七、题记	225
第二章 陆路交通的起源与发展	232
一、道路	232
二、桥梁	265
三、交通工具	276
四、馆驿	293
五、私人旅店	309
六、关津	314
第三章 水上交通	321
一、剡木为舟	321
二、通海巨舶	324
三、飞云盖海	326
四、万斛之舟	328
五、河运之端	329
六、开渠利航	331
七、话说大运河	333
八、早期的航海	338
九、巨海为夷庚	341
十、东渡日本	343
十一、闯荡黑水洋	345
十二、郑和下西洋	348
第四章 邮政与电信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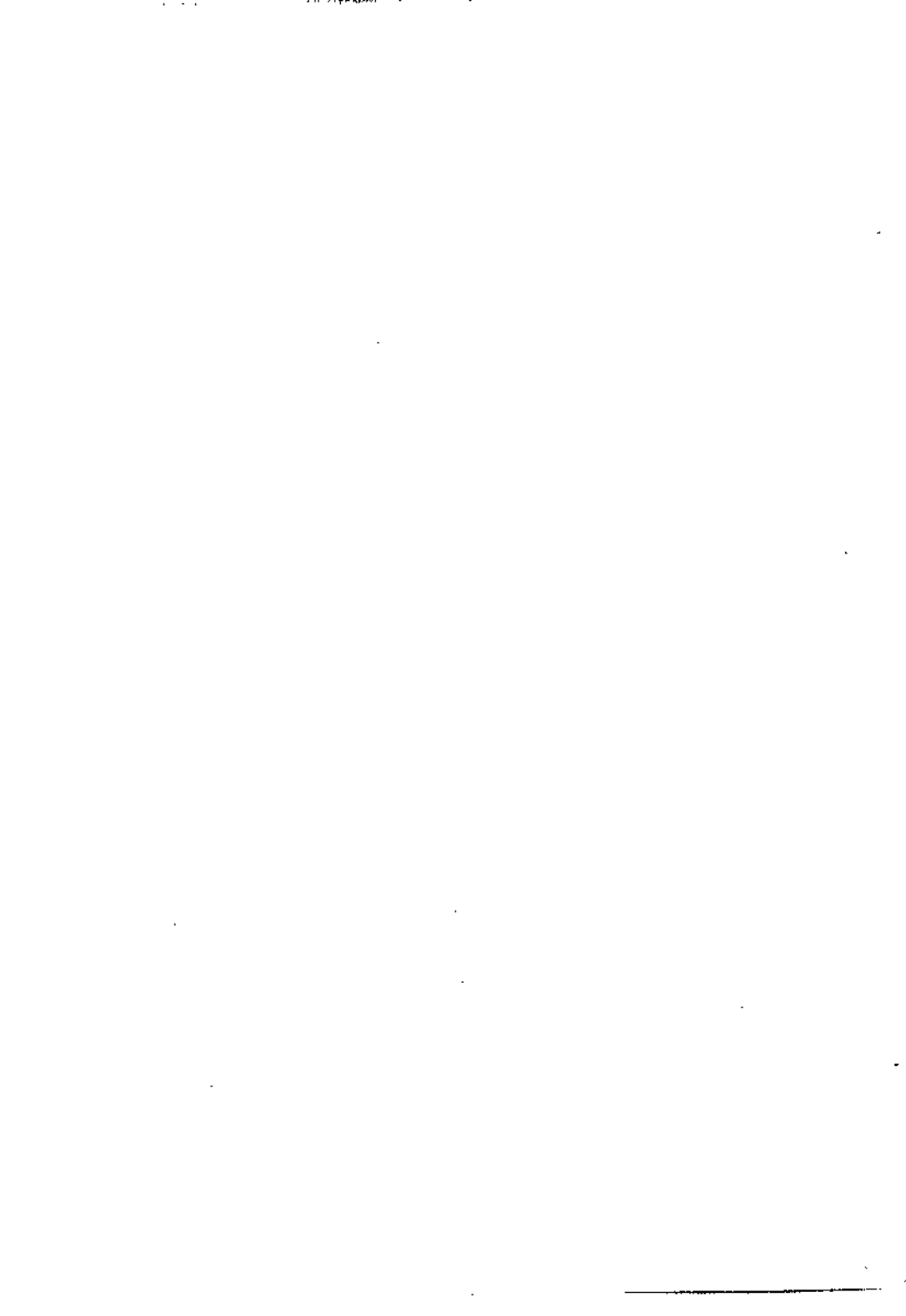
一、古代邮驿	354
二、民间通信	358
三、近代邮政与电信	359
第五章 通往域外之路	365
一、丝绸之路	365
二、天竺求法	369
三、杖策孤征	373
第六章 从马车、火车到飞机	377
一、古代的车辆	385
二、铁路的发轫	387
三、詹天佑与京张铁路	392
四、飞行之梦	393
五、木鸢升天	395
六、展翅飞翔	397
七、长空英雄	185

广 告 史

第一章 广告概论	405
一、广告传播的起源	405
二、广告发展的标志与表现	406
三、广告传播的要素和特征	409
第二章 原始社会末期到鸦片战争前的广告	412

一、奴隶社会及其以前的广告	412
二、战国至隋朝时期的广告	419
三、唐宋时期的广告	424
四、明清时期的广告	432
第三章 鸦片战争到建国前的广告	438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告	438
二、五四运动至 30 年代的广告	445
三、抗日战争至建国前的广告	457
四、旧中国的广告管理	460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大陆广告	466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广告	466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广告	470
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广告	473
四、“文化大革命”中的广告	478
第五章 新时期的我国大陆广告	482
一、广告市场的恢复与发展	482
二、广告媒介的发展	491
三、广告公司的发展	507
四、广告代理制的发展	522
五、广告行业组织的发展	527
六、广告管理法规的发展	554
七、广告教育的发展	580

財
政
史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国家财政

一、中国财政范畴的产生

我国的财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探讨这个问题对研究财政的本质、职能等理论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财政史这门学科首先要涉及的问题。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要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里,只能根据考古材料、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和历史传说,加以说明。

1. 部落联盟中的财政萌芽

我国历史的第一章如果从元谋人(现今发现的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因其化石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一带而得名)写起,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原始人群时期占去了绝大部分,大约在五万年以前,我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为我们画出了母系氏族繁盛时期的图景:当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稻谷、粟之类禾

本科植物，以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如石刀、石斧、石锛、石凿等，还有精制的骨器，如骨制鱼钩、鱼叉等，也有木器和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并彩绘之以几何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农氏似与仰韶文化相吻合。《白虎通》说：“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农耕而作陶”。这个时期的政治是：“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无制令而民从”；“……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古者……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这个时期的经济比原始人群时期大有发展，但显然还没有剩余产品，氏族内部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归氏族成员所共有，一切活动都按传统习惯行事，人与人之间贫富与共，平等相待。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不会有财政这个范畴的产生。

大约五千年以前，我国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公元前28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遗存（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邱龙山镇而得名），绘出了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的图景：这个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但畜牧业已大大发展，出现了农、牧分工的迹象；生产工具则有精制磨制石镰、蚌镰、骨铲等；日用陶器开始用轮制造，并以灰陶为主，这些都比母系氏族大有发展。这个时期的政治，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大为降低以外，墓形大小悬殊，随葬品也多寡不同，这标志着私有财产已经出

现,但还看不出社会制度发生多大的变化。

父系氏族发展到中后期,原始氏族社会渐趋瓦解。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齐家文化(因发现于甘肃和政齐家坪而得名)和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车站而得名)。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当时的经济更加发展,除农业、畜牧业外,手工业已有新的发展。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精细陶器,在这些陶器中,有高柄杯之类的酒器。除陶器外,还有精制的玉器和象牙制品。生产工具除磨制石器、骨器、木器外,还发现了红铜器。从酒具和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当时剩余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剩余已达相当数量。剩余产品的出现给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主要变化是贫富之分更加明显。从大汶口墓群的随葬品可以看出,有的墓葬随葬品十分简陋,甚至空无所有;有的墓葬则使用原始的木椁,随葬品有大量的陶器和石、骨器,甚至有精制的玉器和象牙器。前者无疑属于贫困人家,后者很可能是富有家庭。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从大汶口文化遗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迹象。如大汶口 13 号墓,不仅有较丰富的随葬品,而且有 14 个大猪头,这似可以说明家畜已为家族所私有。郭沫若根据考古资料推断:这个时期,土地虽属公有,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个体劳动和家族耕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因而土地定期分给家族耕作,畜牧、手工业也交由有经验的家族负责。这样,名义上是公有,实

质上是私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力多少不同,强弱不同,家族生产技术、工具、经验等不同,产量自然不会平均,久之,则贫富不均的现象就出现了。掌握各生产部门的家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努力追求私有财产的增值,致使私有观念越来越重,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我国历史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期与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较为相当。《韩非·难一》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圳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农者侵畔,为的是争土地;渔者争坻,为的是多捕鱼。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私有观念之重。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变革。为了治理水患,防御外族进攻或进攻其他部落,血统性的氏族逐渐组成地域性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首领由氏族成员公举,主持部落联盟的会议,决定部落联盟的大小事宜。但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都是由富有家族担任的,传说尧、舜都是富有家族,禹的父亲鲧曾筑城保护自己家族的财产。舜的时候,曾对部落联盟进行了重大改革,设置了主管土地、教化,管理人民、山林川泽,掌管祭祀、刑法等的九个官职,官员达 50 人。这样,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富有家族的议事机构了。而变成富有家族议事机构的部落联盟首领集团,实际上成为了国家形态的萌芽。

这个时期,战争频繁,传说黄帝三战炎帝于阪泉,擒杀蚩尤于涿;又做了大量的民事,如为舟楫之利,方便交通;造白

杵,以舂米;制弧矢,威慑天下等等。战争与民事都要消耗大量的财富。在私有观念已经产生并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取得这批财富,不借助部落联盟议事机构的权威是难以办到的。而借助部落联盟的权威取得大量社会财富的方式,已不属于一般的经济分配范畴了,而属于财政范畴,但因其没有形成体系,因而,我们称之为财政的萌芽。

2. 我国财政范畴的形成

原始氏族末期,社会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酒具的大量出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家畜中不仅有猪、狗,而且有羊、牛、马等;渔猎已降到辅助地位;手工业有了相应的发展,并从农业、畜牧业中独立出来。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铸铜业、制骨业、纺织业、编织业和制陶业的痕迹。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贝和绿松石等物,皆非本地所产,显然是交换贸易得来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观念发展成为私有制度,富贫之分判若云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已经十分鲜明,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墓葬中,不仅可以看到随葬品的多寡不同,还看到有绑着双手被活埋的迹象,这证明,奴隶制度已经出现。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相对年代,上限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下限早于郑州二里岗期间的商代文化。从出土文物的

性质分析,应属于我国传说中的禹夏之时。据我国古代传说,“夏后氏官百”,“夏有乱政而禹作刑”,可能禹夏时,奴隶不断暴动,禹制定了刑法以进行约束。还传说,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挑淮泗而注诸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还传说,禹曾在阳翟筑城设都。

二里头文化遗址与古代传说相印证,足以证明,禹夏时我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这时不仅形成了阶级,而且形成了国家。禹设都城,置百官,作刑律,而且治水工作也颇见成效。这一切,都需要耗用大量财富。尽管禹“卑官室而尽力乎沟洫”,“绝旨酒”,可谓简省,但所要消耗的财富绝不是禹本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那么这笔财富用什么方法取得?无疑要借助国家的政治权利向奴隶和贫民索取。二里头遗址中部的宏伟宫殿建筑,显然是大量被奴役者的血汗与智慧凝结而成的。传说禹征三苗,那么当时的武器、食品之类,无疑也需要占用奴隶的剩余产品,占用贫民的财富和人力。这样一种新的财产分配关系,即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被奴役者强制取得财富和人力的财产分配关系,便从一般的经济分配关系中独立出来了,成为了一种新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制取得社会财富的新的分配关系,我们称之为财政。

关于财政方面的历史传说,在夏以前未见史载,只是到了夏代才逐渐产生并不断增多。诸如《尚书·夏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贡已属财政范畴。《史记·

禹本记》载：“众土交正，致慎财富，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左传·宣公三年》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襄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诸侯向禹进献贡品的传说，都是有关财政方面的。由此可以判断，我国的财政范畴产生于夏代，而最早的财政范畴是贡与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在父系氏族社会中期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阶级和国家都没有形成，这时只有一般的经济分配关系，没有财政分配关系，因为没有剩余产品，所以这种经济分配关系不过是饥饿的分配，充其量是对老者和幼者多一些关照而已；父系氏族后期，生产力有所发展，社会产品有了剩余，这时的经济分配关系已不再是饥饿的分配，而是由谁占有剩余产品的问题，这时私有制的萌芽出现了，并且出现了贫与富的两极分化，于是阶级的萌芽出现了，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富有阶级的利益，于是保护私有财产和富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萌芽就应运而生了，随着国家萌芽的产生，为了实现国家的职能，国家的经济支柱——财政也随之萌芽了；夏禹之时，社会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多，阶级的对立日益严重，国家的职能日益扩大，财政这种分配关系也日益明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并与国家发生着直接联系。换言之，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夏禹时的贡与赋则是我国最早的财政现象。正如《史